

学术大师解析系列
郑家栋 陈 鹏 / 选编

解析冯友兰



学术大师解析系列

解析冯友兰

郑家栋 陈鹏 /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析冯友兰/郑家栋, 陈鹏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

(学术大师解析系列)

ISBN 7-80149-633-7

I. 解… II. ①郑… ②陈… III. 冯友兰 (1895 ~ 1990) —哲学思想—研究 IV.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834 号

· 学术大师解析系列 ·

解析冯友兰



选 编: 郑家栋 陈 鹏
责任编辑: 江 沙 张 敏
责任校对: 同 文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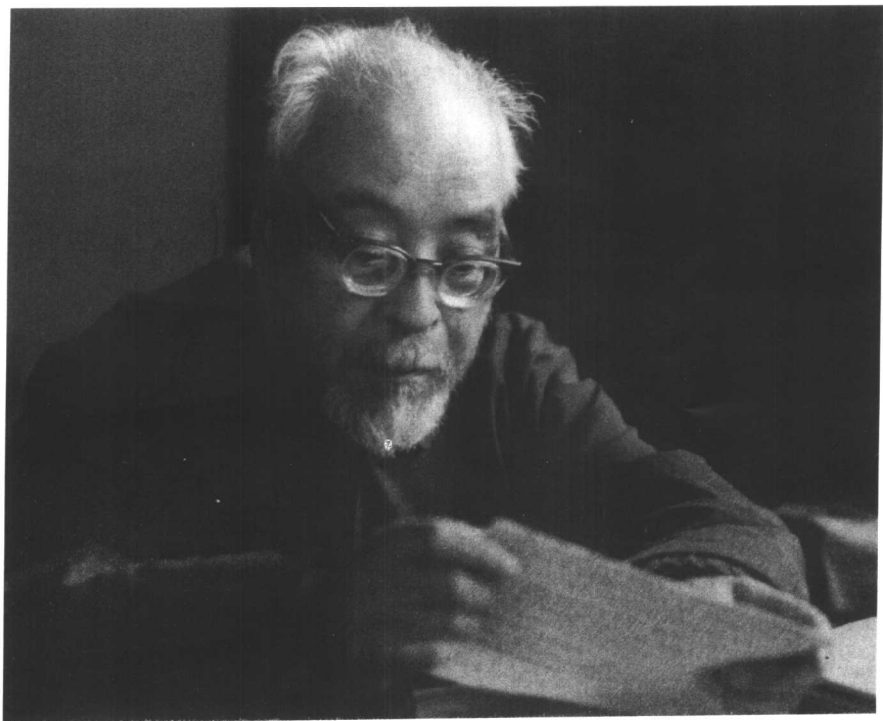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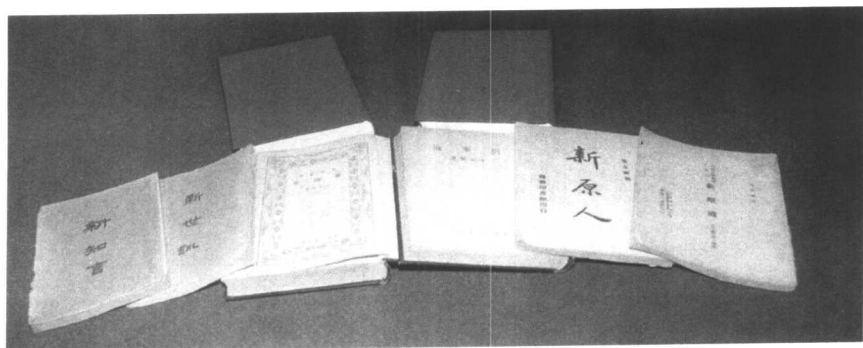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7.75
字 数: 419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ISBN 7-80149-633-7/K · 085 定价: 3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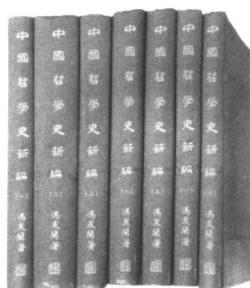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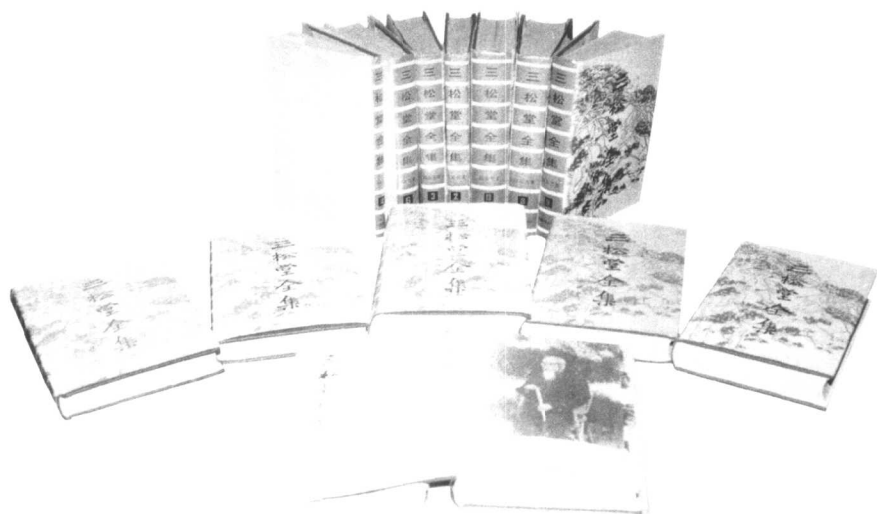
1985年冯友兰已经90岁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还有四册需要完成



“贞元六书”原始本



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的著作总汇《三松堂全集》在他去世后出版



和清华大学的同事合影。前排左起：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后排左起：刘崇鋐，浦薛凤，陈岱孙，顾毓琇，沈履



西南联大复员时的冯友兰



1981年10月赴杭州参加中国哲学史学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与参加会议的日本、德国、加拿大、美国、香港等国家及地区的学者合影。左二为张岱年，左四为狄百瑞，右四为陈荣捷，右二为贺麟



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门前与该大学终身教授狄百瑞合影

试论“冯友兰现象”

——代编序

牟钟鉴

—

冯友兰先生是一直活跃在我国哲学界中心舞台上的大学者，不论在他前半生创立体系、备受赞扬的时候，还是在他后半生另探新路、备受谴责的时候，他都是引人注目的重点人物。他的一生虽不能说富有传奇色彩，却也起伏跌宕，曲折多变，引起各种讨论和争议，直到今天，对他的认识和评价还不能取得大致的统一。引起人们特别关心和争论的人物，必定有两点：一是他的社会影响巨大，人们不能忽略他；二是他的思想行为复杂而有矛盾，不容易看得清楚。现在大家都承认，研究中国哲学可以超出冯友兰但不能绕过冯友兰，他的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性质，他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都富有研究的价值，所以一门新的学问——冯学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冯友兰的学术和经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交错在一起，可以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所以研究冯学，可以通过冯友兰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中国哲学在现代中国的艰难跋涉之途。同时，冯友兰的学术和经历，又具有他自己的独特个性，表现他个人的性情、气质、风格和内心世界。所以研究冯学，又可以把冯友兰作为一个

特例，解剖“冯友兰模式”，以便向社会提供一些别人提供不了的人生智慧和借鉴，在许多方面，它都是极其宝贵的。

许多人都在谈论“冯友兰现象”，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冯友兰现象”是当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应当从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角度把它研究清楚。近读蔡仲德先生文章《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即将发表），对“冯友兰现象”作了很好的分析，他“将冯友兰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历程称为‘冯友兰现象’，认为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缩影，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具有典型意义。”^①他还总结出“冯友兰现象”给我们的四点启示。我赞成蔡先生的基本看法，特别是他把冯友兰的一生分成三个时期，而将其晚年称为回归自我的时期，有这样一个晚年是“冯友兰现象”的重要特征。但我将有所修正和补充。我在《冯友兰晚年的自我反省与突破》（访问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学术论文）中，把冯友兰中期改称“变化自我”的时期，同时对冯先生的晚年有较详细的说明和较高的评价。我这里想就“冯友兰现象”谈一点补充意见。

二

“冯友兰现象”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就其普遍性而言，它可以与“金岳霖现象”、“贺麟现象”、“汤用彤现象”等联系起来考察，它们有共同的地方。例如，他们都是同时代的中国一流大学者，他们在民国年间都在学术上获得了较高的成就，他们走的都是中西文化融合的道路。在1949年以后，他们都感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使中国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表示拥护新中国，并把中国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上面。在50

^①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的“后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各种批判运动中，他们都带着矛盾的心情，在形势压力下，半自愿半被迫地表示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自我批判和批判别人。他们都没有了自信，觉得过去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研究的学术没有价值甚或有负罪感，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向工农大众学习，跟上急剧变化了的时代。但是由于这种转变是在急速的带有强制性的政治运动中进行的，不能自然而然的发展，违背了世界观与学术思想演化的渐进性和自觉性。把学术信仰的改变同政治立场的转变混在一起，在突击式的政治学习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寻章摘句、囫圇吞枣，作简单化的理解，不可能熟练运用，其结果便是：要么索性不再进行理论创造和学术求索，如贺麟和汤用彤；要么勉强去做，而做不出上乘的精神产品，如金岳霖和冯友兰。冯友兰是上述四人之中创作积极性最高的一位，但同三四十年代相比，他的学术创造力也已经大大衰退了，忙于思想改造犹且不及，何暇去运思独创呢？这是时代的悲哀，大师级的学者从此再也写不出大师级的作品，当代的中国学术文化由此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这里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和社会学说，如果出于信仰自由的选择，并且作为一种指南认真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决然能在学术上做出优异成绩，如侯外庐和郭沫若，他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成果至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果是在压力下勉强去做，一定做不好，因为这违背学术发展必须自由思考的规律。以冯友兰先生为例。他于30年代初出齐了《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而后学术创作进入活跃时代。从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的不到10年时间里，他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臻于成熟，连续写作并出版了6本著作，即所谓“贞元六书”，平均不到两年就出一本书，而且是高质量的，越写越顺畅，越写越丰富，最后凝结为《中国哲学简史》，可谓厚积而薄发，故被誉为精美之作，流传全世界。这一切皆是由于

冯先生精思熟虑，积累日久，达到了豁然贯通的境地，写起来自然快捷。而1949年以后，冯先生决心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但他只是对唯物史观略有领会，而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还相当生疏，但又不能不马上去应用，来不及充分消化吸收。同时他对于自己原有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仍深有感情，至少有部分地保留和坚持，而这些保留的以往的学说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协调，他自己还没有想得清楚。在外部政治和思想环境偏左的强大催迫下，冯先生开始做自己不熟悉的工作，就是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写作期间又有不断的政治运动来干扰，这样断断续续，修订、重写，整整花费了40年。如此费时费力，而作品在许多方面仍不能令读者满意，甚至也未能让自己满意。按照冯先生的说法，“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①许多论点自己都拿不准，怎么能写好呢？可见学术研究是不能作为政治任务去完成的，是不能强制人们用一种他不能熟练运用的理论模式去进行的。假如我们设想冯先生是在学术自由的空气里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同时也自由地运用他所熟悉所信服的其他哲学观点，在综合中推出冯先生独具个性的哲学理论模式，用此模式重新整理中国哲学史，以冯先生的思考力、才力和勤奋，一定能写出比现在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不知高出多少倍的新作品，就是原有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也要在它面前黯然失色，这是一定的，我敢断言。可惜历史是不能重来一次的。当社会能够给予学者以自由创作的环境时，大师级的人物都衰老或者死亡了，而像冯先生这样功力深厚、学贯中西的大师，不是短期内能再次出现的。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365页，三联书店，1984。

三

“冯友兰现象”就其特殊性而言，只是冯先生一个人独有的现象，很难找到类同者。冯先生真是与众不同，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不同，因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冯先生身上，就产生极特别的效果，这是颇令人感兴趣的。

“冯友兰现象”的独特性至少有五点。第一，他在国共两党决战而胜负尚不分明的关头毅然决然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从此不再离开，这样的大学者在中国思想史学界大约只有冯先生一人。金岳霖、贺麟、汤用彤等人当时并未出国，一直留在大陆。熊十力走到广州，意欲离开大陆而未果，折返北京。冯先生于1948年3月回到上海，接着回到北京。当时的形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军队则由进攻转入防御，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有利于共产党不利于国民党的变化。冯先生在这个紧要时刻回国，一不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能够胜利的前途上，因为冯先生对国民党不满，而且国民党已露出败兆；二不是为了投靠共产党，以博进身，因为国共两党谁胜谁负仍不分明，决战尚未进行，谁也无必胜的把握。冯先生当然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抱有希望，并不恐共反共，已经设想了共产党可能胜利，但他的主要心思并不在党派的成败上，而是在想：“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①中美交通断绝，回不了祖国，只有在海外当“白华”，这是冯友兰先生绝对不能忍受的。冯先生回国后，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的活动，被推为院士，还应蒋介石之邀到总统府去吃过饭。这些都表明冯先生从美国返回中国的内在动机并不在党派之争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24页。

上，而是出于对祖国这片故土的热爱，他的故土情结之深，是超出党派好恶的。他在美国讲学时，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他只能在祖国这片土地上安身立命，而不管这片土地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所以当他从美国上船的时候，把“永久居留”的签证交给了海关；当解放军快要打到北京，南京方面派飞机来接清华教授们时，他决心留下来，“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①他留下来了，并且想有一番作为。然而他所遭遇的却是连续不断的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运动，是无休无止的自我批判和检查，他被当作一面“白旗”，成为左派理论家批判的靶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么在遭遇这一切之后，他是不是后悔了呢？也没有。他在《自传》里说：“自此以后（指四九年以后），我在人事上虽时有浮沉，但我心中安慰。我毕竟依附在祖国的大地上，没有一刻离开祖国。”^②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一起享受发展的喜悦，备受灾祸的痛苦，他是祖国的忠实儿子。人们可以指责他的政见，批评他的学术，但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指责他不爱中国和中国文化。诚如《离骚》所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支持着冯先生的精神，使他能够度过艰难的岁月，为中国哲学的发展贡献出毕生的心血。

第二，从50年代到60年代文革以前，冯先生长期遭受海外和大陆内部两个方面同时的批判和攻击，其规模和激烈的程度都相当可观，这种情况只有在冯先生身上能看得到，可以说是一种奇特现象。胡适、梁漱溟在大陆受到猛烈批判，在海外却得到一片赞扬。郭沫若、范文澜在海外备受指责，在大陆却颇得推崇。

①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26页。

② 《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77页。

还有一些学者，如金岳霖、贺麟、汤用彤、陈寅恪等人，似乎处于边缘地带，过分的赞美和尖刻的讥评都未曾落到他们的头上。最孤独的是冯友兰，几十年来没有多少人真正信任他，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政治化情绪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海外许多人指责冯友兰“附共”，吃共产党的饭，接受马克思主义，没有忠实追随国民党到底。大陆有关部门则认为冯友兰与国民党关系太深，作过蒋介石的座上客，始终与党不是一条心，所以政治排队一直是中右。在国共两党激烈的政治斗争背景下，一般的规律本来应该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所以凡是反共的都得到国民党的拥护，凡是反蒋的都得到共产党的赞赏。同时，凡是态度不够鲜明而影响又大的人，则往往受到两个方面的指责。冯先生没有去台湾，国民党当然要骂他“附逆”；但他不骂台湾，遵守“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古训，大陆左派当然认为他的立场有问题，不会信任他。海峡两岸长期的敌对，使海内外人士不能不受到这种政治气候的熏染，在评价一些有争议的人物时，难免不带有政治的偏见。而冯先生本来不是一位政治家，他的本色是学者，他既不愿意充当某一党派的政治工具，也不愿意作一个政治反对派，他只是希望当政者重视他的学术地位，让他以学术的方式来影响社会。所以让他来谈政治，他是外行，不得已只能作个表态，他不会干更多的事情。冯友兰当然有他的政治选择和政治立场，可是在他身上他的爱国情怀和对学术的执著实在要超出对政治的兴趣。我们有些中国人非要用政治眼光来衡量冯友兰，是不知冯友兰，也就必然误解冯友兰。其次，冯先生的文化选择走了一条中庸的路线，既要“为往圣继绝学”，又要用当代哲学为传统哲学开出一条新路；既接受学理上的唯物史观，又坚持新理学的共相说、境界说，他走的路实际上是一条综合创新的文化改良主义的道路，所以新派和旧派人物都不满意他。他的前半生用新

实在论来改铸宋明理学，虽然有人赞成，有人批评，但毕竟是学术问题。后半生他改用马克思主义重新整理中国哲学史，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又关系密切，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搬用苏联模式，有很多“左”的教条化的成分，这就不能不引起对冯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评价的争论。按照蔡仲德先生的说法，冯友兰接受马克思主义既被迫又主动，主动中又含有附和的成分，这是个很复杂的过程。^①我认为，主动的成分是从学理上接受唯物史观，重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被迫的成分是套用阶级分析和唯物论与唯心论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而主动和被迫的共同特点是非政治性，不把哲学史的研究变成政治运动的附属品或工具。冯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有被迫的成分，在海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看来，这是独立信仰的自我放弃，是学术生命脆弱的表现，所以颇多非难；在大陆政治化环境中的左派看来，冯先生只要不彻底放弃新理学的全部观点，只要不全盘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理论并且熟练地用于政治批判运动，那就是表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即所谓“贴标签”，而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当时流行的观念：中国传统哲学尤其宋明理学是封建主义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除马克思主义外都是资产阶级的，必须与之彻底决裂，它们不能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因此冯友兰多年形成的中西合璧的早期哲学观念只要一表露，便被认为是抗拒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词汇用得再多也不能改变“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哲学家”的社会定位。总之，海外一些人认为冯先生是激进派，是带了红帽子的学者；大陆一些人则认为冯先生是顽固派，是学术界的一面白旗，这真令人啼笑皆非。冯先生对此的解释是：

① 蔡仲德：《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

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思想，既听取赞扬，也听取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①

冯先生真不愧为运用语言的大师，他用巧妙而富有智慧的话语为自己的孤独作了辩解，同时又把来自左与右两方面的政治性攻击化解为文化观念上的偏议，而不失自己的宽宏大量。复次，冯先生不甘寂寞，非要思考，非要写作，非要重操旧业，非要坚持在中国哲学这块是非之地上耕耘不可，这就不能不招来诸多的麻烦。假如冯先生看到 50 年代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理论性较强的学术都会遭到政治的干预，参加者常有不测之祸，从而选择明哲保身、回避焦点的态度，或者不再写作，或者做一点资料考证的学问，那么他就可以退到边缘，获得较为安宁的生活。但这样于事无补，而且也不符合冯先生的性格。他选择了一条最为艰难的路：无论环境多么复杂险恶，还是要有所作为，要在本职工作上有所开拓，既要为环境所允许，又不能随波逐流，既要跟上时代潮流，又要有自己的创见，并把它们发表出来，这就难免被人误解和受到批判。五六十年代的冯友兰，是从钢丝上走过来的，几次都与右派擦身而过，差一点就会跌入深渊之中。大陆对冯先生的猛烈批判，就是因为冯友兰太积极太有个性，什么“抽象继承法”、“思想的普遍性形式”、“树立一个对立面”，在当时都是

^① 《三松堂自序》，第 367~368 页。

标新立异、不合俗论的。海外对冯先生的批判也是因为冯友兰太积极，同时失掉个性，讲一些大陆时兴的套话空话。海外人士站在局外，不了解因而也不能体验当时大陆文化空气的严峻和险恶，难以想象做一个文化人的艰辛和痛苦，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不准思想甚至不准沉默的历史。所以他们对冯先生的批判就难免过分严厉，在大陆学者看来就有点“说风凉话不牙痛”的味道。其实像冯先生那样已经不容易，还有更多的人不如冯先生。正是由于冯先生的积极有为，才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影响了一大批学者，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而冯先生付出的代价就是饱受夹击的折磨。

第三，在“文革”时期一度丧失自我之后，带着病弱高龄的身体，能够及时爬起来，向世人作出诚挚的自我反省，使自己的思想跃入一个新的境界，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冯友兰。冯先生在“文革”大部分时间里是批斗对象，住过牛棚，备受摧残。可是在1973年开始的评法批儒运动中他站出来批孔，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从而成为“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写作组）的顾问。冯先生是尊孔的，他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怕批孔的灾祸降临到自己头上，为了自保，他采取了“表面上顺着”的策略，主动批孔。当然其中也有糊涂的成分，他已经失掉了自信，觉得应该紧跟潮流，“相信党，相信群众”。不过最深层的还是避祸消灾的意识。诚如宗璞所说：

开始批孔时的声势浩大，又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很明显，冯先生又将成为众矢之的。烧在铁板下的火，眼看越来越大，他想脱身，想逃脱烧烤——请注意，并不是追求什么，而是为了逃脱！——哪怕是暂时的。他逃脱也不是因为怕受苦，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写《新编》。那时他已年近八十。我母亲曾对我说，再关进牛棚，就没有出来的日